

唐宋词名家论稿

叶嘉莹 / 著

迦陵著作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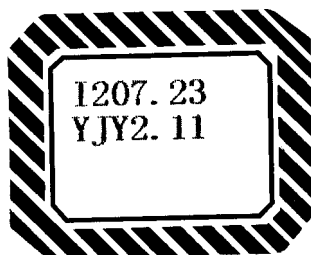
北



A Series of Essays on Ci Master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唐宋词名家论稿

葉嘉瑩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词名家论稿/叶嘉莹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4

(迦陵著作集)

ISBN 978-7-301-13276-0

I. 唐… II. 叶…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②宋词-文学研究 IV. 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7016 号

书 名: 唐宋词名家论稿

著作责任者: 叶嘉莹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276-0/I·201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0.75 印张 257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迦陵著作集》总序

北大出版社最近将出版一系列我多年来所写的论说诗词的文稿，而题名为《迦陵著作集》。前两种是我的两册专著，第一册是《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此书原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在台湾各大学讲授“杜甫诗”专书课程时之所撰写。当时为了说明杜甫诗歌之集大成的成就，曾利用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访了台湾各大图书馆，共辑录得自宋迄清的杜诗注本三十五家，不同之版本四十九种。因那时各图书馆尚无复印扫描等设备，而且我所搜辑的又都是被列为珍藏之善本，不许外借，因此所有资料都系由我个人亲笔之所抄录。此书卷首曾列有引用书目，对当时所曾引用之四十九种杜诗分别作了版本的说明，又对此《秋兴》八诗作了“编年”、“解题”、“章法及大旨”的各种说明。至于所谓集说，则是将此八诗各分别为四联，以每一联为单位，按各种不同版本详加征引后做了详尽的按语，又在全书之开端写了一篇题为《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的长文，对中国古典诗歌中七律一体之形成与演进及杜甫之七律一体在其生活各阶段中之不同的成就，都作了详尽的论述。此书于1966年由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出版。其后我于1981年4月应邀赴四川成都参加在草堂举行的杜甫学会首次年会，与会友人听说我曾写有此书，遂劝我将大陆所流传的历代杜诗注本一并收入。于是我就又在大陆搜集了当日台湾所未见的注本十八种，增入前书重加改写。计共收有不同之注本五十三家，不同之版本七

十种，于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计时与台湾之首次出版此书盖已有整整二十年之久。如今北大出版社又将重印此书，则距离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出版又有二十年以上之久了。这一册书对一般读者而言，或许未必对之有详细阅读之兴趣，但事实上则在这些看似繁杂琐细的校辑整理而加以判断总结的按语中，却实在更显示了我平素学诗的一些基本的修养与用功之所在。因而此书出版后，遂立即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即如当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的周策纵教授，就曾写有长文与我讨论，此文曾于1975年发表于台湾出版之《大陆杂志》第五十卷第六期。又有在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任教的郑树森教授在其《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研究》一文中也曾提及此书，以为其有合于西方结构主义重视文类研究之意（郑文见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所刊印之《比较文学丛书》中郑著之《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更有哈佛大学之高友工与梅祖麟二位教授，则因阅读了我这一册《集说》，而引生出他们二位所合作的一篇大著《分析杜甫的〈秋兴〉——试从语言结构入手做文学批评》，此文曾分作三篇发表于《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报》。直到去年我在台湾一次友人的聚会中还可听到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台湾所出版的我的诸种著作中，这是他读得最为详细认真的一册书。如今北大出版社又将重印此书，我也希望能得到国内友人的反响和指正。

第二册是《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此书也是一册旧著，完稿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原来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王国维的生平”，此一编又分为两章，第一章为“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第二章为“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这两章曾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发表；下编为“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此一编分为三章，第一章为“序论”，第二章为“静安先生早期的杂文”，第三章为“《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这些文稿曾先后在台湾的《文学批评》及香港的《抖擞》等刊物上发表，但因手边没有相关资料，所以不能详记。此书于

1980年首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继之又于1982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并曾被当日台湾的一些不法出版商所盗版。这册书在最初于香港出版时，我曾写有很长的一篇《后叙》，并加有一个副标题《略谈写作此书之动机、经过及作者思想之转变》，文中略叙了我婚前婚后的一些经历，其中曾涉及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中我家受难的情况。台湾的“明伦”与“源流”两家出版社盗版，一家虽保留了此一篇《后叙》，但将其中涉及台湾的地方都删节为大片的空白，并在空白处用潦草的笔迹写有“此处不妥，故而删去”等字样；另一家则是将此一篇《后叙》完全删除（据台湾友人相告云，他们曾将删去的《后叙》另印为一本小册子，供读者另行购买）。直到2000年台湾的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我的《叶嘉莹著作集》一系列著作时收入此书，才又将此篇《后叙》补入书中，同时并增入了一篇《补跋》。那是因为1984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国维全集·书信》一书，其中收入了不少我过去所未见的资料；且因为我自1979年回国讲学，得以晤见了几位王国维先生的及门弟子，也由他们提供了我不少相关的资料；更因为《王国维全集·书信》一书出版后，曾相继有罗继祖先生及杨君实先生在国内之《读书》、《史学集刊》与香港之《抖擞》及台湾之《“中国时报”》诸刊物中发表过一些论及王国维之死因及王国维与罗振玉之交谊的文字。凡此种种，其所见当然各有不同，所以我就又写了一篇《补跋》，对我多年前所出版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又作了一些补正和说明。这些资料，如今都已收入在北大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这一册书中了。至于原来被河北教育出版社与台湾桂冠图书公司曾收入在他们所出版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有关王氏《人间词话》及《人间词》的一些单篇文稿，则此次结集时删去，而另收入其他文集中。因特在此作一简单之说明。

第三册是《迦陵论诗丛稿》。此书共收入了我的论诗文稿十五篇，书前有缪钺先生所写的一篇《题记》。这是我平生所出版的著作中唯一

有人写了序言的一册书。那是因为当中华书局于1982年要为我出版这一册书时，我正在成都的四川大学与缪先生合撰《灵谿词说》。我与缪先生相遇于1981年4月在草堂所举行的杜甫研究学会之首次年会中。本来我早在20世纪的40年代就读过先生所著的《诗词散论》，对先生久怀钦慕，恰好先生在1980年也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迦陵论词丛稿》，蒙先生谬赏，许我为知音，并邀我共同合撰《灵谿词说》。因此当中华书局将要为我出版《迦陵论诗丛稿》一书时，先生遂主动提出了愿为我撰写一篇《题记》作为序言。在此一篇《题记》中，先生曾谓我之论陶渊明诗一文可以摆脱纷纭之众说而独探精微；论杜甫《秋兴》八首一文可以尚论古人而着眼于现代；又谓我之《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一文寄托了自己尚友千古之远慕遐思，《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一文探寻诗人灵台之深蕴而创为新解。凡此诸说固多为溢美之辞，实在都使我深感惭愧。至于先生谓我之诸文“皆有可以互相参证之处”，“是以自成体系”，则私意以为，“自成体系”我虽不敢有此自许，但我之论诗确实皆出于我一己之感受和理解，主真，主诚，自有一贯之特色。则先生所言固是对我有所深知之语。另外尤其要感谢先生的，则是先生特别指出了此书中所收录的《简谈中国诗体之演进》与《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两篇文稿都是我“多年前讲课时之教材，并非专力之作”，则先生所言极是。这两篇写得都极为简略，我原来曾想将之删除，但先生以为此二文一则“融繁入简”，一则“考证详明”，颇“便于教学参考”，且可以藉之“见作者之学识工力”。因先生之谬赏，遂将之保留在此一集中，直至今日。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加说明的。另外先生又曾于《题记》中评介了我的一些诗词之作，我对此也极感惭愧。但先生之意主要盖在提出“真知”之要“出于实践”，这自然也是先生一份奖勉后学之意，所以我乃不惮烦琐，在此一一述及，以表示我对先生的感激和怀念。本书最后还附有我的一篇《后叙——谈多年来评说古典诗歌之

体验》，此文主要是叙写我个人研读态度之转变与写作此类文字时所结合的三种不同的方式。凡此种读者自可在阅读中获知，我在此就不一一缕述了。

第四册是《迦陵论词丛稿》。此书共收论文八篇，第一篇标题为《古典诗歌兴发感动之作用（代序）》，原是1980年上海古籍为我出版此同一标题的一册书时所写的一篇《后序》。当时因中国开放未久，而我在海外所选说的一些词人则原是在国内颇受争议的作者。所以就写了此一篇《后序》，特别提出了对于作品之衡量应当以感发之生命在本质方面的价值为主，而不应只着眼于其外表所叙写的情事。这在词的讨论中较之在诗的讨论中尤为重要。因为诗中所叙写的往往还是作者显意识中的情志，而词体在最初即不以言志为主，所以词中所表现的往往乃正是作者于无心中的心灵本质的流露。这种看法，直到今日我也未曾改变，所以我就仍取用了这一篇《后序》，作为北大出版社所出版的我的这一册同名之著作的《前言》。至于此书中所收录的《温庭筠词概说》、《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大晏词的欣赏》、《拆碎七宝楼台》与《碧山词析论》及《王沂孙其人及其词》诸篇，则与我在《唐宋名家词论稿》一书中所收录的一些分别论说各家词的文稿，虽在外表篇目上看来似颇有重复之处，但两者之间其实有相当大的不同。此一书中所收录的大多以论说作品为主，所以对各篇词作都有较详的论说和赏析。而《唐宋名家词论稿》则主要以论说每一位作者之整体风格为主。而且凡是在此一册书中所论述过的作者和作品，在另一册书中都因为避免重复而作了相当的删节。所以有些读者曾以为我在《唐宋名家词论稿》一书中对于温、韦、冯、李四家词的论述颇为简略，与论说其他名家词之详尽者不同，那就正因此四家词既已在此书中作了详细论述，因之在另一册书中就不免简化了的缘故。至于此一册书中所收录的《王沂孙其人及其词》，则是写于《唐宋名家词论稿》以后的作品，所以

在论述方面也作了避免重复的删节。因此读者要想知道我对名家词之全部论见,实在应该将这两册书合看,才会得到更为全面的理解。至于这一册书所收的最后一篇《论陈子龙词——从一个新的理论角度谈令词之潜能与陈子龙词之成就》一文,则是在这一册书中写作时间最晚的一篇作品。当时我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唐宋词转移到了清词,只不过因为陈子龙是一位抗清殉明的烈士,一般为了表示对陈氏之尊重,多不愿将之收入清代的词人之中。这正是当年龙沐勋先生以清词为主的选本只因为收入了陈子龙词而竟把书名改为《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缘故。而我现在遂把《论陈子龙词》一文收入了不标时代的这一册《迦陵论词丛稿》之中了。不过读者透过这一篇文稿的论说已可见到,此文已是透过论陈子龙词对前代唐宋之词所作的一个总结,而且已谈到了陈词与清词复兴之关系,可以说正是以后论清词的一个开始了。

第五册《唐宋词名家论稿》,这一册书可以说是在我所出版过的各种论词之作中论说最具系统、探讨也最为深入的一本书。那是因为这册书的原始,是来自缪钺先生与我合撰的《灵谿词说》。关于缪先生与我合作的缘起及《灵谿词说》一书编撰之体例,我在该书中原写有一篇《前言》,标题为《谈撰写此书的动机、体例以及论词绝句、词话、词论诸体之得失》。《灵谿词说》一书于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十年以后当河北教育出版社要为我出版《迦陵著作集》的系列书稿时,曾征询得上海古籍之同意,把《灵谿词说》一书中我所撰写的一部分收入此一系列著作中,而改题为《唐宋名家词论稿》。此书共收入我所撰写的论文十七篇,除了第一篇《论词的起源》以外,以下依时代先后我分别论述了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璟、李煜、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苏轼、秦观、周邦彦、陆游、辛弃疾、吴文英及王沂孙共十六位名家的词作。我在当时所写的那一篇《前言》中,原曾提出过说:“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

种线的概念。”又说：“如果我们能对每一点的个体的趋向，都以说明文字加以提示，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又说：“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如今我所选说的这十六位词人虽不能代表唐宋词之整体的发展，但也具体而微地展示了词之发展的过程。这与我在《前言》中所写的理念自然尚有一段距离，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读者或者也可以从这一册书中窥见我最初的一点“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的既能“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也能得到“史的知识的满足”的一种卑微的愿望。所遗憾者，这册书既是我个人的著作，遂未能将当日缪先生所撰写的二十二篇论文一并收入。不过，缪先生已出版了专集，读者自可参看。而我在本书之后则也仍附录了缪先生所撰写的二十二篇的篇目，用以纪念当初缪先生与我合作的一段情谊和因缘。

第六册《清词丛论》，此一册书共收论文十一篇，第一篇《从云间派词风之转变谈清词的中兴》，此文原是一篇讲演稿，本不应收入著作集中，而竟然收入了进来，其间盖有一段因缘。原来早在1993年4月，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曾举办了一次国际词学会议，会议中文哲所的林玫仪教授曾邀我为文哲所即将出版的一系列论词丛书撰写一册论清词之专著。当时我因为早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便已写有几篇论清词的文稿，所以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林教授的要求。岂知会议之后我竟接连不断地接受了赴各地讲学和开会的邀请，自计无法按时完成任务，于是乃商得林教授的同意，邀请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邦炎先生与我共同合作，订出了我们各写四篇文稿以集成一书的约定。及至1996年截稿时间已至，陈先生所担任的四篇文稿已全部写作完成，而我却仍欠

一篇未能完卷。因此林教授遂临时决定邀我再至文哲所作一次讲演，而将此次讲演整理成一篇文稿收入其中。那就是本书所收的第一篇文稿《从云间派词风之转变谈清词的中兴》。所以此文原系讲稿，这是我不得不在此作出说明的。至于本书所收录者，则除去前所叙及的讲稿外，尚有自《清词名家论集》中收入的三篇文稿，计为：

- 1.《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
- 2.《谈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之词与词论及其影响》；
- 3.《说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兼谈传统士人之文化修养与词之美感特质》。

此外本书还增入了自他处所收入的七篇文稿，计为：

- 1.《论纳兰性德词》(此文原发表于台湾的《中外文学》，因手边无此刊物，对发表之年月及期数未能详记，下篇亦同)；
- 2.《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此文原发表于台湾的《中外文学》，其后曾收入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之《迦陵论词丛稿》)；
- 3.《清代词史观念的形成与晚清的史词》(本文也是由讲稿整理而成的，原来是因为2000年夏天台湾中研院曾举行过一次“谈文学与世变之关系”的会议，在此会议前后我曾做过几次相关的讲演，本文就是这些讲演的录音整理稿)；
- 4.《由〈人间词话〉谈到诗歌的欣赏》；
- 5.《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
- 6.《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以上三篇自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之《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之《附录》中选录增入)；
- 7.《记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手抄稿本〈迦陵词〉》(本文原是为

南开大学图书馆成立 80 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其后被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的《叶嘉莹作品集》收入其系列论丛的《清词散论》一书中，现在是据此书增入）。

从以上所写的对本书内容之说明来看，则此书所收录的各文稿其时间与地域的跨度之大，已可概见一斑。因特作此说明，供读者之参考。

第七册《词学新论》，此书共收论文六篇。但第一篇题名为《迎陵随笔》之文稿，其所收之随笔实共有十五则之多，这一系列的随笔，是我于 1986 至 1988 两年间，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几位编辑朋友之邀约而写作的。当时正值“文革”后国家对外开放未久，一般青年多向往于对西方新学的探寻，所以就有朋友劝我尝试用西方新说来谈一谈古代的词论。因而这十五则随笔所谈的虽然主要仍是传统的词学，但先后引用了不少如诠释学、符号学、语言学、现象学和接受美学等多种西方的文论。其后又因每则随笔的篇幅过于短小，遂又有友人劝我应写为专文来对这些问题详细加以讨论，因此我遂又于 1988 年写了一篇题为《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的长文（曾刊于 1989 年第 2 期之《中华文史论丛》）。而适值此时又有其他一些刊物向我索稿，我遂又先后撰写了《对常州词派张惠言与周济二家词学的现代反思》及《对传统词学中之困惑的理论反思》两篇文稿（前者曾于 1997 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学刊》第一期；后者曾于 1998 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四期）。而在此之前，我实在还曾引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写过一篇题为《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长文，曾于 1992 年分上下两期发表于台湾出版的《中外文学》第 20 卷之第 8 期与第 9 期。最后还有一篇题为《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的文稿，此文本是为 2000 年在台湾“中研院”召开的“文学与世变之关系”的国际会议而写作的，其后曾发表于《天津大学学报》2003 年之第 2 期与第 3 期。以上六篇文稿都曾引用了不少新

的西方文论，因此遂一同编为一集，统名之为《词学新诠》（台湾的桂冠图书公司也曾出版过与此同名的一册书，收入在他们2000年所出版的《叶嘉莹作品集》中，但北大此书之所收入者则实在较台湾同名的一册书增加了更多的内容。因此遂在此结尾处略加说明）。

第八册是《迦陵杂文集》。此书收集我多年来所写的杂文成册，其实我这些“杂文”与一般人所说的杂文在性质上实在颇有不同。一般所说的杂文，大都是作者们随个人一时之见闻感兴而写的随笔之类的文字，而我则因为工作忙碌，平时实在从来不写这种杂文。我的这些所谓的“杂文”，实在都是应亲友之嘱而写的一些文字。其间有一大部分是“序言”，另有一些则是悼念的文字。至于附录的一些所谓“口述杂文”则大多是访谈的记录，或应友人之请而由我讲述再由学生们记录的文字。这一册杂文集自然卑之无甚高论，但亦可因此而略见我生活与交游之一斑。因作此简短的说明。

前 言

——谈撰写此书的动机、体例以及论词绝句、词话、
词论诸体之得失

《灵谿词说》是四川大学历史系前辈学人缪彦威(钺)教授与我正在合作共同撰写的一本论词的书。这本书的写作,对我而言,有两点极可纪念的意义:其一是遇合之可贵,其二是体例之创新。

先就遇合之可贵而言。我对缪先生之敬仰,盖始于三十年前初读其著作《诗词散论》之时。我自幼即耽读古典诗词,此虽由家庭环境之熏习,然亦出于一己之天性。当时每读历代诗词之名篇佳什,常常会引起我心中一种感发不能自己之情,而又苦于学识之浅薄幼稚,虽恍然若有所得,而未尝能自言其所得。昔《秦风·蒹葭》之诗,有“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之句,我想这就是当年我在阅读古典诗词时,心中所常具有的一种感受。在这种渺茫的向往追寻之中,前后曾经有两本评赏诗词的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感动:一本是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另一本就是缪先生的《诗词散论》。这两本书的性质,其实并不完全相同。我之阅读《人间词话》,盖始于我还在读书的髫龄时代,而我之阅读《诗词散论》,则已在我大学毕业开始教书之后。《人间词话》是我在学习评赏古典诗词的途径中,为我开启门户的一把锁钥;而《诗词散论》则是在我已经逐渐养成了一己评赏之能力以后,使我能获得更多之灵感与共鸣的一种光照。《人间词话》所标举者,是评赏

诗词之际，所当体悟的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衡量及辨析的准则；而《诗词散论》则是对个别的不同体制之韵文与不同风格之作者，在本质方面的精微的探讨。二书之性质既不尽同，我在阅读二书时之所得也并不尽同。不过在我的感受之中，这两本书却也有着一些根本上的相似之处，其中最值得称述的一点，就是此二书之作者所叙写的，都是他们在多年阅读和写作之体验以后的所谓“深辨甘苦，惬意贵当”之言，这与一般作者之但以征引成说或夸陈理论为自得的作品，是有很大不同的。再则，此二书之作者，似乎都各自具有一种灵思睿感，正如缪先生在其《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所说的，“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这正是此二书之所以能使读者在阅读时得到极大之感悟和启发的主要缘故。而更可注意的一点则是，此二书之作者在心灵感受方面，似乎原来便有着某些相近之处，古人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诗词散论》之作者，在其论王静安之文中，乃能独具深悟，且于篇末对静安先生之自沉深致叹惋。我个人既然自早岁即耽读静安先生之著作，是以在阅读缪先生《诗词散论》之时，乃亦不免常有一种“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其后在1970年代初期，当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撰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之时，遂亦每每引用《诗词散论》中论王静安之语，而我对于此二书之作者，亦更增加了一份钦仰景慕之心。不过自古以来，因读其书而慕想其人的读者，常未必都有能与其所慕想之作者相逢一晤的机缘遇会。昔杜甫之于宋玉，就曾有过“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悲慨；辛稼轩崇爱陶渊明，在其一首《水龙吟》词中，曾写有“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的想象，又在其一首《贺新郎》词中，曾写有“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的句子；然而就在同一首词的后面，稼轩所写却也是“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的悲慨。至于我所钦慕的二位作者，则《人间词话》之作者既早已

成为古人，而经过多年动乱之后，我对于《诗词散论》之作者，也早已不敢抱有冀能一见之想。但谁知就在我并不敢抱有一见之想的情况下，却意外幸运地与《诗词散论》的作者不仅得到了相识见面的机会，而且蒙受到极深重的知赏，更进而能开始了共同撰写论词专著《灵谿词说》的合作，这对我而言，当然是极可宝贵的一种遇合。

这次遇合是发生于1981年4月，在成都杜甫草堂所举行的杜甫学会第一届年会期间。当时有人曾把我所写的一篇论杜甫七律的文稿提交给了杜甫学会年会，而当我接到通知信件时，距离开会的日期已经很近，我任教的加拿大的大学，正当学期将近结束之际，本来不易抽暇前来开会，但因为杜甫原是我平日非常崇仰的一位诗人，而且我以前还曾经讲授过杜甫诗专书的课程，何况开会的地点又是在成都的杜甫草堂，我想在如此可纪念的诗圣故居之地，来和祖国的学人交流学习杜诗的心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此便匆匆地订了机票，飞回祖国到成都参加会议。当时加拿大的温哥华正值繁花似锦之季，但我想草堂的春天一定更美，所以在飞机上还曾经口占绝句一首，说：“平生佳句总相亲，杜老诗篇动鬼神。作别天涯花万树，归来为看草堂春。”就是带着这样兴奋的心情，我来到了成都的杜甫草堂，也就是在这次草堂的杜甫学会中，我幸运地见到了夙所钦仰的《诗词散论》的作者前辈学人缪彦威先生。这对我而言，当然是一种意外的惊喜。记得当有人把我介绍给缪先生时，我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早年读过您写的《诗词散论》，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而恰好在不久之前，缪先生也读到了国内刊行的我的一本《迦陵论词丛稿》，因此，缪先生对我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也读过你的《论词丛稿》，你的意见与我很接近。”其后在大会中，我曾提出了有关杜甫七律之演进的报告，并言及我在海外每读杜甫《秋兴》中“每依北斗望京华”之句，辄不禁深怀故国之思，1977年返国，曾写有“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今日我来真自喜，还乡值此

中兴时”之绝句。先生对我的报告及诗作，亦颇为称赏。当时先生因目疾才动过手术不久，视力受损，行动皆依赖其孙男元朗扶持左右，且大会日程甚为紧张，上、下午皆有会议及讨论，我虽然因侥幸得遇久所仰慕之前辈学人而欣幸无已，然而却因为恐怕先生过于劳累，故除在会场中聆听先生之谈话及讨论以外，并不敢向先生多所请益。岂意先生嘉赏后学，自相遇之次日起，即每日在中午休息时间，令其孙男元朗邀我前往谈讲诗词，我时或妄言己见，先生亦每每加以奖许。而先生在终日讨论及开会之后，更利用晚间余暇，不顾目疾视力之损，先后为我书写旧作诗词横幅二纸，且以旧著多种相赠，临别之日，又书赠七言律诗一首，诗云：“相逢倾盖许知音，谈艺清斋意万寻。锦里草堂朝圣日，京华北斗望乡心。词方漱玉多英气，志慕班昭托素襟。一曲骊歌芳草远，凄凉天际又轻阴。”诗中对我之奖饰，我虽然愧不敢承，然而先生之以“知音”见许以及惜别之情，则使我甚为感动。大会结束后，我曾随与会诸人士至江油县参观李白故居，先生以目疾行动不便，故尔未曾参加。两日之后，我始重返成都。翌晨临上飞机前，特趋谒先生住所辞行，则先生方伏案展纸，盖已在草写致我之书信矣。见我之来，先生甚为欣喜，即将未写完之信稿举以相示，信中先生曾引汪容甫与刘端临相知订交之事以相似比，云：“昔汪容甫与刘端临闻名而思，既见而相许，不数日而遽别，离索之感，悒结于心。容甫与端临书云：‘诚使学业行谊表见于后世，而人得知其相观而善之美，则百年易尽，而天地无穷，今日之交，乃非偶然，离别之故，又不足言也。’循诵斯言，聊自解慰，并愿与左右共勉之。”又在信中提出合作之构想，云：“如蒙不弃，愿相与合作，撰写评论诗词之书，庶几如汪容甫所谓‘使学业行谊表见于后世’，则尤所欣盼者矣。”夫以先生年辈之尊、学养之崇，而奖励后学，殷拳若此，此种情谊，即使在常人得之，亦将深为感激，何况我自三十年前便已对先生久怀钦慕，其感激之情，当然更非言语可喻。因此，我在飞返加拿大的航